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3.017

教鞭的革命:智能课堂语境下的思政教师主体重建之思

张耀天,王杰,毛婧

(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要:智能课堂成为当前大学教育改革创新的技术主流形式,在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实践等方面,对大学思政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智能课堂以强势的技术理性,在成就一场教鞭的革命的同时,冲击着传统大学思政教师的主体作用,消解着传统大学思政教师的权力主体、话语主体和价值主体,反向鞭策教师拥抱技术。思政教师的主体架构亟待重建,既意味着对大学思政课堂的技术反思,也意味着从智能课堂的缩影、反观数据技术强势下人的价值重建。

关键词:思政课堂;工具理性;主体重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3-0110-06

Revolution of the Pointer: Thoughts of Restoration of the Principl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ZHANG Yaotian, WANG Jie, MAO Jing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2,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Classroom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form of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practice,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lligent classroom, with its strong technical rationality, while achieving a pointer revolution, threatens the main role of traditional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undermines the principle position of power, voice and values of traditional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and pushes teachers to embrace the new technology. The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s in urgent need to be reconstructed, which means not only the technical reflection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in universities, but also the value recovery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ong data technology inspired from the example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rinciple position restoration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如何办好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统一”的具体要求,为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其中就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原则,给广大思政教师在教学方式、教学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指明了新方向、明确了新思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教学的趋势,推动了一场世界性的课堂革命,其主要特征即以信息化技术、互联网思维及当下大数据革命所带来的革新性力量,融入传统课堂的教学环境中,在实现教学技术创新、教学方式创新和

教学思维创新的同时,改变了传统教学课堂环境下的主体-客体关系,学生被动学习、教师填鸭学习的模式得到了有效改善,师生线上线下的互动、理论实践生活的互融都在不断加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主导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迅速推动了互联网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慕课(MOOC)为例,从2008年肇始到2012年兴起,再到今天风靡全球大学校园的教学潮流,速度之快超乎人类教育史上的所有技术。以慕课为代表的智能课堂潮流,给整个教育行业带来的不只是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学效果的呈

收稿日期:2023-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项目:智慧课堂环境下大学思政教师主体价值重建研究(19VSZ096)。

作者简介:张耀天(1981—),男,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政教学研究,E-mail:1465763006@qq.com。

现,不少专家则忧虑这种颠覆式的创新对传统大学教育的影响,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2012年预言:“从现在起的15年里,一半多的美国大学将破产或处于破产之中”^[1]。2013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试水中国版慕课,清华大学于10月正式开通“学堂在线”。2014年,慕课教学模式在北京师范大学思政课堂使用并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广,线上教学与手机终端的APP结合,成就了诸如微课堂、雨课堂、蓝墨云、学习通等一系列慕课形式的教学辅助软件,为改进大学思政课堂教学方式,提升大学思政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创新思路。

事实上,对教学信息化的支持最早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2001年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就提出:“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信息技术及当下数据技术在政府主推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传统课堂改革和技术创新的新趋势,智能课堂则作为传统课堂信息化改革的集中性成果。智能课堂的出现,既符合互联网文化、数据技术的基本特征:以更大数据、更多信息和更快效率实现课堂效果、强化师生互动,一改传统课堂的诸多弊端;但同时也冲击和消解了人类几千年来传统课堂所形成的教育氛围文化、教育场景构建、教育效果呈现等理论和实践体系。对于智能课堂的发展,学界已呈现两个极端的意见分流:趋之者奉若圭臬,反对者弃如草履。笔者认为,在大学思政课堂的场景内,智能课堂形式积极地实现了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工具理性,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鞭的革命。在解放课堂实现创新的同时,传统教师的课堂角色、教学地位和教育功能等主体性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何在强势技术理性冲击下实现大学思政教师主体的重建,成为智能课堂语境下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

一、教鞭的革命:数据技术驱动下课堂权力结构的演变

智能课堂的出现,一方面符合大数据技术高效率、高效益、高质量的要求,打破传统教学课堂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虚拟和线上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解放了传统课堂教师的局限性,拓展了教学场景、实现了教学自由;另一方面,智能课堂以亲和的互联网技术、熟悉的手机终端设备和丰富的教学素材,激发了传统教学课堂渴望实现的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丰富教学素材数据库和教学内容实现多样性的数据技术之上。从这个角度出发,智能课堂彰显了人类工具理性的能力,突出呈现了教鞭革命的意义。之所以称之为教鞭的革命,在于这种课堂形式的变革不再是单纯的教学工具、教学模式的变化,而是构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教学理念、教学意义的变革。

媒介授权的转变。智能课堂模式的展开,不能再单纯将之视为计算机技术或互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它是建立在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教学过程中师生教学相长的互动,转化为线上、线下的互动,师生关系不再是知识传播主体和知识信息受众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智能课堂的模式,形成新的“媒介授权”^[2]。按照保罗·莱文森对信息传媒的界定,传统的媒介是按照线性的传播方式,对信息受众进行定向、单向度的信息传播。传统课程所形成的媒介关系即是一种的单向度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如果将讲台类比为舞台,学生则是观众,且是被动的知识信息受众的观众,但在智能课堂语境下,从媒介授权的角度去理解,作为信息受众的学生借助于互联网技术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在现实课堂前后与课程本身(而非教师)展开虚拟性的参与和讨论,智能课堂消解了传统课堂教师的主体权力,赋予了学生新的课堂主体权力——学生通过弹幕、评论、传播等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媒介权力。吊诡之处在于,赋权的来源不是教师而是课堂,教师不再是课堂权力的主体,在智能课堂的环境下教师既成为与学生同样的信息主体,也要开始重新适应互联网教学的新玩法。

个体权力的彰显。传统大学思政课堂环境的主体权力研究范式,契合于福柯所谓的话语权力的两个层面。其一,意义上的话语权力。话语暗合于社会结构的运营之中,“话语隐藏于复杂的权力关系中,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3]。大学课堂的思政话语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相关范畴构建话语体系并进行课堂传播。这就意味着大学思政课堂既具有知识信息的传播,也实质地符合思政学科教育意识形态立场的特点。其二,形式上的话语权力。传统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师大多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硕士、博士,既拥有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的课堂权威,也是展开教学的主导者。如此教学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往往被批判者诟病为“填鸭式”教学。但不可否认的是,意

识形态教育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的特征。这种权力式的教学保证了大学思政课堂以本为本的确信性,“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4]。智能课堂的问题在于,传统课堂权力架构下的学生客体在新技术环境下嬗变为活跃的互动主体,娴熟于互联网技术和数据技术的大学生成为挑战传统课堂的新权力主体。

技术权力的浮现。《大数据时代》的作者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在今天已经演化为一种凌驾于传统权力架构之上的技术权力,大数据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5]。构建在大数据技术基础之上的智能课堂,在“互联网+”的时代形成了以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新教学形式,一改传统意识形态教育课堂说教为主的课堂形式,把技术权力正式引入到课堂环境中来——“经由数字科技所开启的总体自动化认知资本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已发展成了计算性资本主义(算法资本主义+网络化资本主义)”^[6]。嵌入到终端智能手机以课堂软件形式表达的技术及其背后掌握着数据资源的机构、公司,成为影响大学思政课堂除教师主体、学生主体之外的第三种权力,技术权力第一次借助教鞭的革命走上教育历史的舞台。

二、教鞭的胜利:智能课堂语境下技术工具理性的高扬

2018年开始,第一届“千禧宝宝”走进大学。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宠儿,他们的成长背景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代皆有不同:在生存环境上,远离了战争、瘟疫和饥荒;在成长环境上,进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开放时代,地球村、全球化的概念内嵌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在文化氛围上,浸润于互联网文化语境中,互联网技术已经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80后、90后通过电子游戏、娱乐通信的形式来接触互联网技术相比,00后这一代人则更以正常、平视、理性的态度观察和使用互联网技术。这种技术的亲和态度,恰恰反映了技术理性的深层影响,即已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

00后对互联网技术或数据技术有天然的亲近感,从某种意义上讲“低头一族”或“拇指文化”^[7]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技术对生活宰制的生动写照。“数字原住民”正在或已经建构了他们的数字化习性,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数据技术的全面渗透,不仅对00后这一代成长环境产生重要

的影响,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结构对社会架构的影响,技术凌驾于社会之上成就为新的技术主体,换言之,技术开始全面影响人的现实生活境遇。工具理性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技术呈现,一方面不断地为现实生活提供便捷。以思政课堂为例,诸多互联网元素的融合,亲和了师生关系,形成了多元互动,提高了教学的成效。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开始主导性地改造大学思政课堂,当前不少高校出现追捧技术至上的倾向。当然,理性的方案是把互联网技术视为机遇与挑战的并存。

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着传统世界的格局和面貌,智能课堂作为科学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领域中,带来的不仅是教鞭的改革,更是工具理性的高扬。

其一,教鞭的革命,催生了学生的价值成熟。在传统课堂模式中师生关系呈现明显的主客体形态:教师作为知识信息的拥有者和传授者,在课堂上拥有绝对权威的主体地位,学生既要保持知识信息受众的身份,也要接受教师的训诫进而实现规训。传统大学思政课堂模式的互动性较差,一般以单向度、“填鸭式”教学为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课堂创新的措施之一,即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智能课堂突出强调学生主体性,课前、课中和课后,线上、线下,虚拟场景和实体场景都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价值,激发学生的自我学习积极性,保证教学效果。

其二,教鞭的革命,鞭策着教师的学无止境。作为教学技术面目呈现的智能课堂,可以视为教学工具的延伸——教鞭的革命,改变的不只是教学工具,并且深层次地改变了教师的主体认知能力。思政课堂教育技术的创新发展,鞭策大学思政教师不断接受新鲜事物,打破传统思维惯例用于创新。同时,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加之大学生所处的青春期心理阶段,给大学思政教师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注重互联网信息的筛选和甄别,如对信息的辨别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反应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统摄课堂的同时,也要统摄信息^[9];更要在智能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明确树立价值观、人生观、信仰观。

其三,教鞭的革命,重塑着课堂的资源结构。智能课堂语境下的大学思政课堂,充分汲取了互联网的客户端理念,明确了学生体验为中心的理念,充分关注了在校大学生群体认知结构及情感结构,以大数据技术为中心,打造以信息技术为资源整合方式的学习模式。智能课堂更类似于一个信息整合平台,“相比传统媒体,它有高度的聚合性,即它可以把所有的传统媒体功能聚合到同一平台中,并把它们发展成新的媒体高技术”^[10]。作为信息平台的智能课堂把各种数据技术打包,形成一种新的技术话语范式:“移动互联网的这一特性为互联网+思政课教学带来了无限的表达可能,因为3D、VR、AR等技术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并且在未来还会不断创造视听奇迹。”^[10]它之所以受到不少高校思政教师的推崇,在于互联网+思政课教学已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把思政课打造成一场视听盛宴,牢牢吸住大学生们的眼球,满足相关教学管理部门提出的关于到课率和抬头率的各项指标^[10]。从这个角度出发,智能课堂鞭挞着教学技术在整合教学资源的同时,开始全面渗透到教学生活中,“在这种追求效率、效果的、简单的、线性的实体逻辑习惯的指导下,教学的技术融入正面临着实践上的困难甚至危机”^[11]。

三、主体的消解:技术强势架构下教师价值理性的藏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下,教师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的功能,也享有绝对权威的权力地位。“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2],传统课堂的教师地位已经突破了课堂空间的限制:它不仅是一种经验智慧的象征,更是社会权力架构中的重要一环。智能课堂的语境下,借助于数据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在教学空间上改变了传统教学场景的效用范围,O2O的线上线下模式、VR的虚拟实境模式、慕课的多元参与模式,都突破了传统教学课堂的限制,延展了传统教师地位的影响范围。在教学效果方面,技术的力量促使教师转变了教学方式,师生互动的民主课堂一改传统课堂的线性教学方式,技术力量异化为智能教师,对学生开展积极引导与指导、参与课堂讨论,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智能课堂的出现,呈现为强势的技术力量对课堂改革的作用,但同时教鞭的革命并没有真正地成为教师手中顺从的工具,而是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异化力量:“异化——它从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

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与自为之间、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的对立。”^[13]智能课堂作为科学技术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人类数据技术载体的一个重建方式,传统课堂和教师的价值正在被消解。

其一,传统教师权力的消解。智能课堂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技术,把新技术引入到教学课堂。当前大学思政课堂流行的如雨课堂、微课堂、蓝墨云等APP实现翻转课堂,把数据资本天然带有的效率效益思维嵌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把大学思政课堂打造成为视听盛宴。问题在于,较之于智能课堂的技术力量,从传统人文世界中走来的教师,既不能短时期内成为技术专家,也不能以个人智慧对抗强大的技术优势:“数字信息呈现出存储大容量化,传递网络化、双向化、多媒体化,处理自动化、实时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其传播在互动性、及时性、自由性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4]。智能课堂的技术手段不再甘于以技术理性的身份呈现,进而演化为一种技术权力:一方面是技术本身成为大学思政课堂师生主体、客体权力结构之外的第三种权力;另一方面,思政教师开始主动迎合技术发展的要求,主动融入技术发展的趋势,且已取得不俗的效果,清华大学慕课网站学堂在线统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在该慕课平台的上课人数早已经双双突破万人大关^[15]。工具理性的强势与传统教师的主体价值产生冲突,并压迫着传统教师权力作用的范围,并不断被消解。

其二,传统教师价值的遮蔽。智能课堂最大限度地借助科技的进步实现大学思政课堂的效果。作为教育技术的智能课堂本质是服务于教学目的,即通过教学技术不断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学手段,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于,教育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课程的大学生思政,既涉及思政知识、国史党史,也涉及信仰教育、价值教育,做到知、信、行的融会贯通。如单纯地强调技术工具的作用,大学思政课堂极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坠入到技术崇拜的思路,淡化价值教育(教师价值和课堂主题价值)的底色。韦伯指出:“工具合理行为取决于对周遭客体和他人行为的期待,这些期待被行为者当作达到自己合理追求和计算目标的条件或手段,价值合理性行为是为某些意识到

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行为的其他形式的价值本身的信念所决定的行为,他与成功的希望无关”^[16]。原本服务于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不再安分于服务教师的主体价值,成为异化于主体的独立力量,遮蔽教师价值。

其三,传统教师主体的藏匿。大学思政教育的目的,是把大学生培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传统教师一般主导性地承担着教学主体的作用。而在智能课堂的环境中,教师所讲授的信息与知识被互联网和教学APP所替代,教师的授课过程被技术所左右等。教师不再是教师,而是容易被替代的课堂活动的组织者,教师学习的专业知识和课堂活动中主体性开始藏匿于强大的技术理性之后,技术主体凌驾于教师主体之上,教学APP进入课堂教学过程,是传统教师逐渐向技术妥协的过程,同时不断地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价值性。

四、主体的重建:人文立场上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

话语权力,是教学主体权力实现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与内涵。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一再强调“话语即权力”,对于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学来讲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其一,大学思政课堂是社会主义大学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大学课堂的底色。大学思政课堂的课堂话语,就应该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这是课堂性质使然,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其二,大学思政课堂的传统教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语境下,从思政读本出发契合国家时政热点,坚守“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四个回归要求,明确教师的课堂主体地位,即明确了社会主义办学的立场和原则;其三,大学思政课堂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阵线,西方和平演变的思潮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侵蚀与影响,借助所谓的价值多元化大行历史虚无主义之道。从这个角度出发,福柯的理论更有意义:“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和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知识的效力”^[17]。

当数据技术以智能课堂的形式介入到大学思政课堂场景后,技术开始异化成为除传统的主体客体力量之外的第三种课堂力量。大数据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场景中展示了它的魔力:它不仅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技术力量,而是演化为一种干预并内化

现实生活的标准,实现了福柯笔下所谓的规训功能。当然马克思早有如此觉悟:“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拉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风、水、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18]。福柯把社会管理过程中管理制度的呈现类比为技术,技术附着于权力主体实现社会训话的功能。智能课堂最大程度融合着当下数据技术的所有呈现:微博、微信、QQ等即时通信的便捷性,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的海量信息,VR、3D等技术的视觉效果表达。传统的大学思政课堂转变为娱乐、活泼、多元的信息舞台。传统思政教师的主体不仅被学生为本的时代优势所倒逼,更被智能课堂的技术力量所压迫。同时,数据技术的冲击也造成大学思政教师两重焦虑:“其一是失业焦虑,即思政教师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会被互联网替代和超越,从而产生未来失业恐惧感。其二是湮灭焦虑,即建立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的自我特异性,有可能在这一转换中失去依托、从而湮灭在新模式的同一性中”^[10]。这些都意味着智能课堂语境下大学思政教师的主体作用亟待重建。

其一,话语主体的重建。大数据技术尽管影响并改变着大学思政课堂的现状,但大学思政教师依然是信息的“把门人”角色。换言之,无论网络技术与信息舆论如何填充着课堂内容、改变着课堂形式,思政教师依然是思政课堂真正的话语主体,只有扮演好大学思政课堂的信息“把门人”,不明辨、不明确、不明白的信息,不能传播更不能主动传播。有些课堂讨论,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9]。甄别好意识形态的真伪与敌友,才能在多重表达的信息形式中重建信息化的话语主体,把智能课堂作为开拓大学思政课堂新领域的技术,回归于思政教师的主体作用。

其二,技术主体的重建。当前传统思政教学的教学模式的确存在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式单一的滞后性。如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改变传统大学思政教学的诸多弊端,在趣味性、宣传性上实现技术突破,融合大学生线上线下生活,智能课堂技术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解决方案。智能课堂的技术介入,从星星之火到蔚为大观,已形成众多高校思政教育课堂改革的潮流——无论是教学理念改变的现状,还是教学方式改革的必要性,都促使大学思政教师在接受技术性规训的同时,转变思路、拥抱技术、成为掌控智能课堂技术的新主体。

其三,人文主体的重建。大学思政教师的专业

出身,即有科班的思政专业,多是文史哲的大文科背景,这就为大学思政课堂的人文精神构建提供了师资资源。大学思政课堂的教育理念,是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需求基础上的人文教育,它应该以“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教育实现铸魂育人的基本目标。智能课堂的技术所带来强势的工具理性,如果脱离了教师主体的人文关怀会演化为异化的技术力量,对思政教学本身产生负面效应,如马克思说所言“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9]。唯有回到精神的品性塑造(福柯晚年对技术理性思考的结果),回到思政教师的人文主体,智能课堂技术才能真正地服务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阵地。

智能课堂的出现,不仅改变着传统大学思政课

堂的授课方式、授课场景,实现了教鞭的革命,也以强势的技术理性鞭策并改造着大学思政教师的主体地位及其作用。对于该问题的思考,不仅涉及对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问题,也涉及信息多元渠道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问题,同时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数据时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业已形成了强势的数据霸权,消解了传统文化所构建的主体能动性。对大学思政智能课堂技术应用的考察具有样本意义,它关乎传统社会人的主体建构、话语权力及理性价值问题,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教育学的意义。回归到教师的职责及人文精神的领域,在技术狂欢的数据时代,大学思政教师不应该成为被鞭策者,更应该做一个积极的技术参与者,完成主体的重建。

参考文献:

- [1] 于颖.慕课会颠覆传统高等教育吗?[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85.
- [2] 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4.
- [3] 李智.从权力话语到话语权力——兼对福柯话语理论的一种哲学批判[J].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2):108-113.
- [4]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28.
- [5]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04.
- [6] 吴冠军.速度与智能:人工智能时代的三重哲学反思[J].山东社会科学,2019(6):13-20.
- [7] 倪颖.“拇指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J].高教论坛,2018(4):100-103.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 [9] 张耀天,周青山.冲击与融合:大学思政教学智能课堂环境下教师能力重建之思[J].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8-103.
- [10] 刘秀峰.高校“互联网+思政课教学”的现在与未来[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8(5):125-128.
- [11] 卢强.教学的技术融入: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6(6):77-83.
- [12] 杨柳桥.荀子诂译[M].济南:齐鲁书社,1985:152.
- [13] 马克思.1844经济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9.
- [14] 赵屹.数字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10.
- [15] 杨莘.互联网技术变革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J].国家治理,2016(26):23-28.
- [16]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7.
- [17] 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53.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6.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